

绝密档案

背后的传奇(十)

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档案》栏目组 编著

获国家广电总局第二届全国电视文化(文艺)
优秀栏目奖 北京电视台品牌栏目——《档案》



中共党史出版社

获国家广电总局第二届全国电视文化（文艺）
优秀栏目奖 北京电视台品牌栏目——《档案》

绝密档案

背后的传奇  (十)

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档案》栏目组 编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卷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 10/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中心
《档案》栏目组编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098-2648-5

I. ①绝… II. ①北… III. ①世界史—通俗读物
IV.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2423 号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 潘 鹏

复 审: 王世英

终 审: 姚 鸿

责任校对: 龚秀华

责任印制: 谷智宇

责任监制: 贺冬英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b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240mm 1/16

字 数: 253 千字

印 张: 17.5

印 数: 1—6000 册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2648-5

定 价: 28.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 010-82517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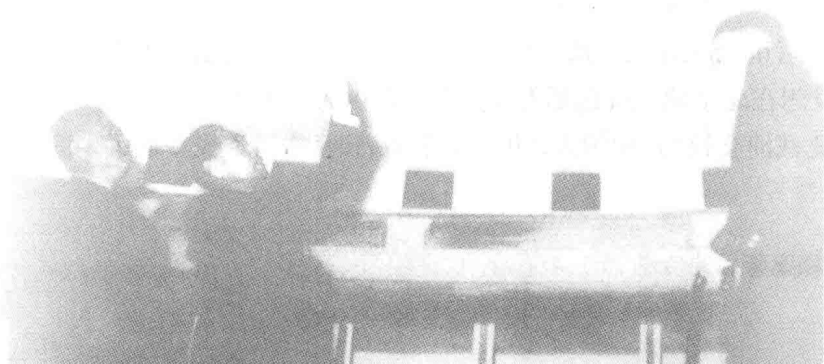
1-14	人民大会堂：设计的杰作
15-29	奇迹是这样诞生的：人民大会堂建造之谜
30-40	不可思议的人民大会堂第一宴
41-55	周恩来与《东方红》不能不说的秘密
56-73	中英联合声明：“铁娘子”与“钢铁公司”的碰撞
74-86	舌尖上的主权：驻港部队进驻香港背后
87-103	最后的探戈：末代总督彭定康
104-117	较量：香港回归
118-129	锦鲤鱼国际贩毒案
130-147	“毒王”刘招华
148-158	大毒枭谭晓林案告破内幕
159-173	“金三角”毒枭罗星汉覆灭记
174-184	“金三角”毒枭糯康
185-200	中俄列车大劫案



201-215	绝密行动：奇袭东京
216-233	陌路逢生：袭击东京之后
234-248	复仇计划：猎杀山本五十六
249-262	密苏里战舰上的秘密：日本签署投降书背后
263-273	把裕仁天皇拉下神坛

人民大会堂：设计的杰作

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奇迹，是新中国领导人与国内几乎所有建筑专家日夜奋战的成果，共提出84份平面方案、189份立面方案，设计用的图纸不计其数。每一张图纸上都浸透着设计师们的汗水和心血，这一切都只为实现全国人民和毛泽东的梦想……



1945年4月23日，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这是迎接黎明的日子。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伴着庄严的《国际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召开了。

就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写在了党的旗帜上，毛泽东在大会上庄严地宣布：“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

一句话令在场的755名代表信心倍增，激动不已。但他们不知道，此时毛泽东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梦想在酝酿。

毛泽东环视着这座只能容纳1000人的礼堂，心中浮现出了另一个数字，一万人！

他说：“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要建一座能容纳一万人开会的大礼堂！”

13年后，毛泽东在北戴河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实现这个梦想！要在北京建一座万人大会堂！

13年过去了，毛泽东终于决定要实现这个梦想，可是在当时，离这个梦想实现的距离还很遥远，甚至有人提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完成这项任务的关键一环，沈勃，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兼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委员。

沈勃原名张豫苓，曾经是活跃的学生运动领袖，当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被迫离开北平，并改名沈勃。他毕业于北大工学院土木系，是党内难得的城建专业技术干部。1958年7月，为了首都建设工作，北京市委派出了一个城市建设考察团到苏联。完成一个月考察任务后，沈勃随考察团回国。

刚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沈勃就被叫到了北京市委，他以为是要他来汇报出国考察苏联城市建设的情况，没料想得到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北京市委领导从北戴河带来上面的指示，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央设想在北京建一批包括万人大会堂在内的重大工程。

北戴河会议后，中国人认识了十个新名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钓鱼台国宾馆、北京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万人大会堂。这就是北京著名的十大工程。

国务院和北京市委把十大国庆工程中的八项交给了沈勃所在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

沈勃的任务，就是负责统一领导这八项国庆工程的设计工作。

1958年参加国庆工程工作时，沈勃刚好40岁，干劲十足，但压力很大。这个压力，主要就来自万人大会堂。

沈勃回忆，在他接到的八项国庆工程中，规模最大、内容最复杂、设计要求最高的建筑就是万人大会堂。这也是他倾注最大精力的一项。

“以前都没做过这么大的工程，你比如说万人大礼堂，都找不到有什么先例可寻。”

没有先例可寻，这是沈勃面临的关键问题。

中央提出的要求是“一万人开会，五千人吃饭”，而在当时，一个能容纳一万人同时开会，五千人同时吃饭的地方，上到中央领导下到普通群众，没有人见过，甚至全世界范围内，也没人见过。

20世纪50年代之前，全世界没有可以同时容纳一万人开会的厅堂。莫斯科最中心的克里姆林宫，建于14—17世纪，原意为“城堡”，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政治宫殿，最大的厅堂能容纳六千人。英国的议会大厦，1840年后建成，被称作日不落帝国的“大脑”，最大的厅室不到两千平方米。美国国会大厦，1793年奠基，是美国议会政治的核心舞台，最大的厅堂也只能容纳三千人。而此前中国人做过的最大、最复杂的建筑，就是现在的北京展览馆，之前叫做苏联展览馆，建筑面积只有5.04万平方米。

设计工作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实例，完全是一张白纸。沈勃犯了愁。

然而，设计空白尚还可以摸索进行，这还不是最让沈勃头疼的。“知道北京大规模地建设改造开始了，很高兴。但是另一方面心情很紧张，因为我们深深知道搞好这些大的建筑，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个困难十分大。”

沈勃最头疼的，就是时间太短！

因为是国庆工程，所以中央要求在1959年10月1日之前竣工并交付使用。沈勃一算心头一惊，这就意味着起码要在1959年8月之前完工，才能赶

上国庆节交付。

接到任务时是1958年8月，这样一算，只剩下一年时间了！

克里姆林宫陆续建了200多年；美国议会大厦建了55年；英国议会大厦建了20年。而这个要容纳一万人开会，五千人吃饭的地方只给了一年时间。这根本就不可能！

原来，1958年，中国正处在“大跃进”时期，全国上下争产争收，大炼钢铁，浮夸之风日益严重。国民经济面临严重危机。而中苏关系又趋于恶化，赫鲁晓夫在自夸本国共产主义的同时，大肆攻击中国的“大跃进”搞糟了，“穷得没有裤子穿”。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提出要在经济建设方面有所突破，要做几项经典工程，向世界展示新中国的面貌和实力。这几项经典工程就是著名的十大建筑。1958年9月8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火速赶到中央电影院，为国庆十大建筑做动员报告。主席台下坐了1000多位在京的设计和施工单位的领导们。

沈勃清楚地记得，在当时的动员大会上，万里用坚定的语气对大家说：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自己建设现代化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实际行动回答他们！

接着万里下了明确指示，时间紧迫，这批工程要边设计、边施工、边备料，设计部门要尽快拿出方案，施工部门要力争在10月份破土动工。

沈勃绷紧了神经，不到一个月就要破土动工，这就意味着留给设计工作的时间所剩无几。而另一方面施工部门已经开始加紧备料和组织施工队伍了。

沈勃清楚，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又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办法只有一个——集中专家，全国上下一盘棋。

动员大会第二天，沈勃就提请北京市委与中国建筑学会联名向全国各地著名建筑专家发出邀请电报，这份特殊的电报立即飞向了17个省、市党政领导的案头和建筑学家手中。

3天之内，来自17个省市的建筑师、设计师陆续抵达北京，这些人可都是各地的设计精英、泰斗级人物。其中包括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张镈；北京市规划

局主任赵冬日；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杨廷宝等30多位专家。他们被安排在北京和平宾馆，而和平宾馆的设计师正是杨廷宝。

由于事起仓促，不少专家接到通知后，连来北京做什么具体工作都不大了解。9月10日专家到齐当晚，沈勃就赶到和平宾馆向专家们介绍情况，大家这才明白事情原委。

王炜钰，当年34岁，清华大学建筑系青年教师。与沈勃顶着巨大的压力不同，作为被邀请的专家，她是另一番心情：“当时去了回来就特别兴奋，因为在我们建筑师，尤其是中国建筑师的心目里，大的公共建筑多半都是外国设计。但是在这一次要做这么大的建筑，而且要反映我们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面貌，我觉得这一点很受鼓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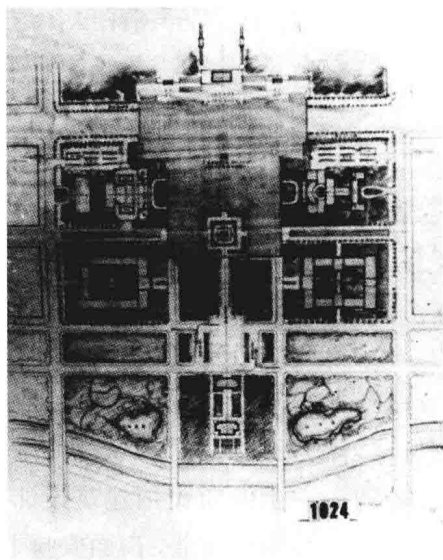
国庆工程给了国内建筑师们一次大展拳脚的舞台，听完沈勃的介绍，专家们干劲十足，都想在祖国的心脏上留下自己的杰作。

沈勃提出的要求是五天之内设计出第一稿方案。这更激起了专家们强烈的创作欲望。沈勃也早就为专家备好了工具。专家的房间里有画板、画架、圆规、三角尺这些绘图工具，拿起就能干。这些都是沈勃派人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搬来的。有些专家当天晚上就铺开纸笔行动起来了。

五天之后，第一稿设计图纸如期完成，根据市委审查提出的意见，又用五天专家们拿出第二稿，共100多张图；审看提出意见后，一周内又出了第三稿，仍然没通过。

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干什么，上来就要求五天出一稿，没有任何先例，没有任何参照，完全不知道要建成什么样，就这样16天出了三稿，速度之快可见一斑，可是效果不

人民大会堂设计图纸



理想。

眼看着16天过去了，已经逼近了施工部门动工的日期，沈勃急得直上火。他仔细地地理了一下方案迟迟定不下来的原因，这16天里碰到的最大难题就出在选址上——万人瞩目的天安门广场！

国庆十大工程中，万人大礼堂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被安排在天安门广场，因此沈勃带领的专家团队首先要面临的就是这个大广场如何设计布局的问题，也就是万人大会堂这个梦想到底落在哪里。

天安门广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以世界其他几个著名广场做对比，意大利的威尼斯圣马可广场，面积是1万平方米，巴黎的协和广场是8万平方米，莫斯科的红场10万平方米，而天安门广场的大致轮廓是南北长800米、东西宽500米。比莫斯科红场还要大4倍。

这么大的广场到底应该如何布局才合理，各路专家发生了激烈争论。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并不是现在的格局。

从1949年开国大典时在天安门上空的航拍影像可以看出，那时的天安门广场保留着皇城特有的凸字形格局。清朝时期的天安门城楼前东西两翼各有一道三座门，东为长安左门，是古时“金榜题名”揭榜的地方；西为长安右门，是朝廷集中审判犯人的“秋审”场所；南边在今天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有一座大清门。在这四座门之间，红墙连接，围成一个封闭的广场，这就是保持了几百年的旧天安门广场。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天安门广场一直处于规划阶段，此间天安门广场陆续拆除了部分红墙和宫门，并在金水河畔建起了观礼台，但是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关于建筑师们的分歧，沈勃回忆道：“第一个争论就是大会堂是摆在广场的西边还是摆在广场的南边？第二个争论就是人民大会堂的高度能不能超过天安门城楼？”

对于这两个问题，尤其是大会堂摆在哪里才能和六朝古都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30多个专家几乎一人一个想法。

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陈植的设计方案，是把万人大会堂安排在了广场西面靠北，南面安排了历史博物馆；广场东面的北边安排的是国家剧院，南边是革命博物馆。他用四座建筑物组成广场，全部对称，讲究的是

平衡。

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赵深设计的方案，他在纪念碑南边，东西两面分别安排了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纪念碑北边，东面安排国家剧院，西面安排万人大会堂。在这个方案里，建筑物更多的是起到拱卫天安门广场的作用。

除了前面两种思路，还有另外几种思路。

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刘敦桢等人设计的总体方案为代表，安排其他四座国庆工程在两侧，将南面的前门楼和箭楼拆除，之后万人大会堂建在天安门对面。这个方案把大会堂放在了广场上独一无二的位置上。

另一个思路是以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戴念慈设计的总体方案为代表的。在纪念碑以南，东面建国家剧院，西面建青少年宫，纪念碑以北，东面建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西面建万人大会堂。这个方案把国家剧院和青少年宫摆在广场上，减少了广场的政治色彩。

还有以无记名的设计总体方案为代表的思路。这个方案强调了天安门广场的城市休闲功能。纪念碑以南全部绿化，纪念碑以北，靠东面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靠西面建万人大会堂。

这么多方案，专家们无法达成共识，迟迟定不下来，沈勃向上汇报了这个情况，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非常重视。

第三稿方案一出来，当天晚上，彭真就召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开会，对专家们争执最大的两点给了意见：

第一，人民大会堂要建在广场的西边（也就是人民大会堂今天所在的位置）；第二，人民大会堂的高度可以高过天安门城楼。最终天安门广场的整体布局选择了叫做第十号总体设计方案的思路。广场上，纪念碑两侧，东边为革命历史博物馆，西边为人民大会堂，两个建筑遥遥相望。不再安排其他建筑。这样的布局，既体现了人民参政议政的万人大会堂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党的领导和革命政权的性质。

而人民大会堂高过天安门城楼，体现出人民群众至高无上的地位，寓意深远。这样，第三稿中天安门广场的布局就已基本成型了，万人大会堂这个梦想终于确定了落脚之地。

位置虽然确定了，可这仅仅是个开始，设计工作仍然困难重重。

第三稿中天安门位置确认的三天后，沈勃又要求设计部门出了第四稿，后来又经过市委领导与各方专家讨论先后出了第五稿，时间转眼到了1958年国庆，方案还是没有定下来。这时，施工部门和材料部分都在催促出图。

离交工日期只有短短10个月了，从设计到施工部门，再到市委领导，都心急如焚。

还是那个办法——全国上下一盘棋！

万里在征得周恩来同意后，决定选择现有方案中有特点的制成照片发出去，扩展思路，广泛征求意见。

沈勃和冯佩之负责按照万里的指示草拟文件。信是发往全国的，包括了全国23个省和5个自治区，以及13个重要城市：成都、西安、兰州、重庆、上海、天津、杭州、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南京和包头。

“经过二十多天苦干，提出了不少设计方案，从当前情况来看，各设计方案的平面布置意见较为一致，但对立面造型方面意见仍很不满意……”信里提出请各省市多提意见，最好也能设计几套方案。并且要求“请于10月底以前将意见和设计方案寄来我市规划管理局办公室。落款：北京市人民委员会1958年10月10日。”

从这封信的内容看，全国各省和重要城市一个不落，而且要求不到一个月就拿出反馈意见。给出的时间已经很紧了。而信里面说的“对立面造型方面很不满意”，这个“立面造型”方面的问题就出在了万人大会堂的“万人”两个字上！

北京市规划局设定的大会堂建筑用地标准是：东西宽140米，南北长270米，共计37800平方米；规定建筑面积不能超过7万平方米。

而对着这7万平方米的数字，设计师们像被绑住了手脚。

一万人开会的大会堂在世界范围根本没有先例，也就没有人真正清楚一万人开会，五千人吃饭到底需要多大地方。而7万平方米根本不够用！

当时的首都剧场，每人每座分摊面积是13平方米，按这个标准推算，一万人开会一万张座位，起码需要13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已经远超过7万平方米的标准。除了座位，最起码还要有供代表写字的桌子，要有走廊、过厅、主席台。除了礼堂之外，周恩来还提出过要有能容五千张座位的大宴会

厅，有若干中型宴会厅。人大常委会还需要办公场所。大会堂内还要有卫生间、厨房等设施。

所有设计师都在绞尽脑汁，想着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7万平方米。但没有人能做到设计得完全合理。

这时有人提出，既然7万平方米不够用，能不能缩减一万人这个人数，改建一个小一点的礼堂。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个万人大礼堂，不仅仅是毛泽东13年前的一个梦想，它还是13年后全中国人民的梦想。

那时北京作为首都，无疑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然而北京作为这样一个中心，新中国成立快10年期间还没有一个能畅畅快开会的地方。

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和国家级别的大型室内会议，地点通常选在中南海怀仁堂。比如1954年9月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南海的怀仁堂举行，然而当时我国人口已达6亿，限于会场的规模，出席会议的代表仅1226人。1955年兴建了政协礼堂，也只有1520个坐席，规模远远不够。至于北京市举办各种活动，室内多是选择北京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音乐堂。室外多选择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以游园的方式进行。而万人以上的大会，地点多选在天安门广场。

在室外开会，虽然参加人数多，规模和气势宏大，但受天气的影响大。群众集会和纪念活动还可以，要坐下来研究商讨国家大事就不方便了。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农业生产形势好转，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能有一个直接聆听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声音的地方。

所以，万人大会堂不能缩小。

人数和空间都是硬性规定，且离交工只有10个月了，周恩来要在10月6日审定方案，还剩6天时间。设计师们纷纷行动起来，连夜加班做第六稿方案。

1958年9月30日傍晚，沈勃来到设计师们下榻的宾馆。看到很多人眼睛都熬红了，还有的在带病坚持工作。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劝说设计师们休息一下。

这天的晚饭，沈勃特意给每桌加了两道菜，一瓶酒，并且把交稿日期推

迟了一天。这样，设计师们才好好吃了顿舒心饭。

1958年10月6日，第六稿完成；三天后，第七稿完成。但这些方案仍然僵在了7万这个数字上。

而在1958年10月10日，施工部门负责的天安门广场的拆迁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方案定不下来，关于施工的备料方面一切准备工作都无法进行。各部门上上下下都坐不住了。

就在沈勃他们认为再也进行不下去的时候，一个人的脚步打破了这个僵局。

1958年10月的一天，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

一位将近50岁的男人前前后后来来回回地在偌大的广场上走了很多遍，他一步一步低头走得认真，走了不知多少回之后，又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这个奇怪的身影，就是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那天，他来来回回一步步地走，实际是在用步子测量这个“一万人开会，五千人吃饭，常委会办公”到底需要多大地方。用这种方式，刘仁终于理解了这些日子设计师们的困境，他清楚，七万平方米对于万人大会堂确实远远不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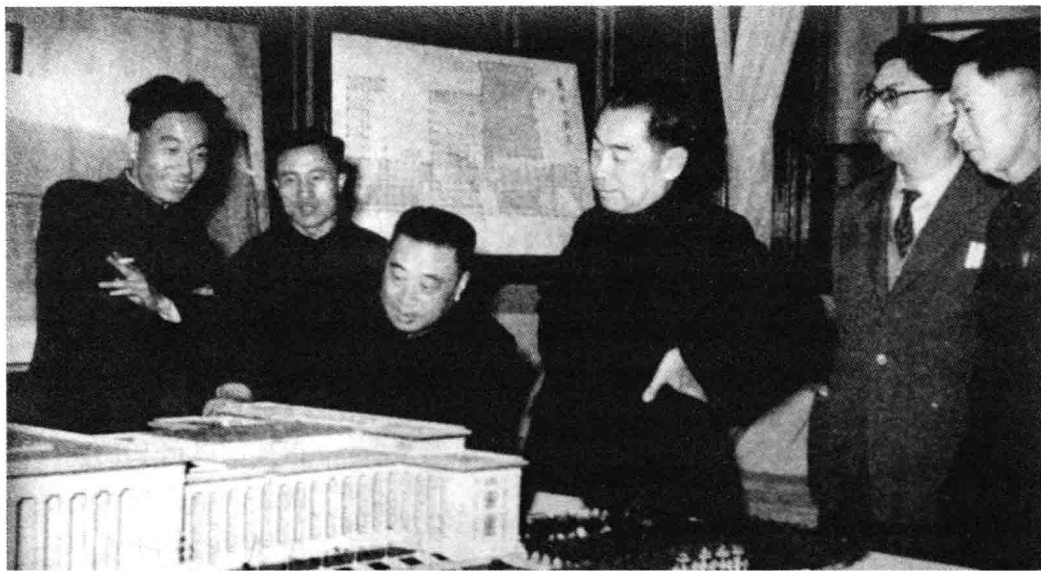
刘仁当即找到了北京市规划局技术室主任赵冬日等人，指示他们可以作一个全新的方案，七万平方米可以突破！

按照刘仁的指示，赵冬日和同事们很快就做出了新的设计。时间越来越紧，1958年10月14日，万里得到通知，周恩来当晚会从外地回到北京，回京后将立即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赵冬日当即将方案送到中南海等待总理审查。

这天晚上，周恩来从10点开始审查，一共送来三份方案，分别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北京市规划局，他反复比较三份方案的平面图与立面图，仔细询问其中的细节问题。

周恩来在参考了万里等人的意见后，最终选中了北京市规划局提交的方案，也就是赵冬日等人负责领导设计的新方案。就这样，人民大会堂的初步方案确定了！此时已经是半夜一点多钟。

周恩来之所以会选择这套方案，是因为此前万人大会堂的设计方案，由于建筑面积不足，一直存在布局局促的问题，而规划局的方案突破了这



周恩来审查人民大会堂
设计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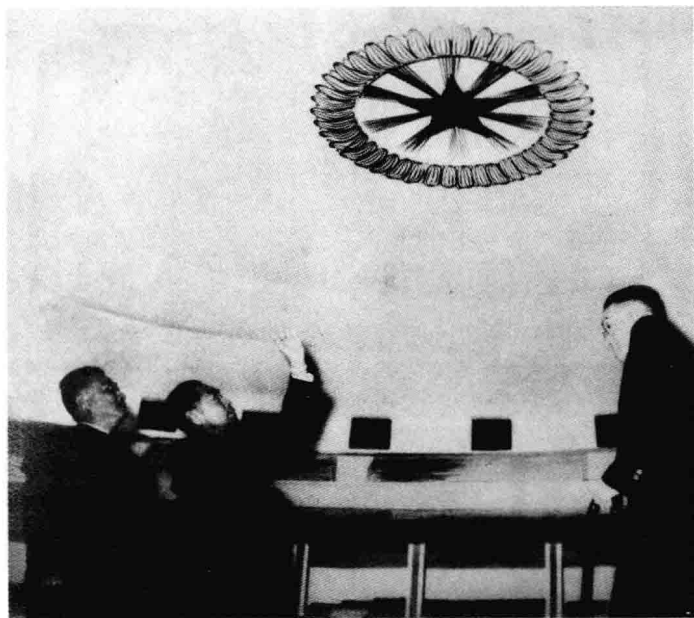
个僵局。

方案中万人大会堂的占地面积从140米×270米扩大到210米×340米，建筑面积从7万平方米扩大到了17万平方米。比原来扩大了两倍多。这就使得新方案中的万人大会堂布局上显得合理、实用并且大气。

新方案中万人大会堂平面呈“凸”字形，北面是大宴会厅，中间偏西位置是大礼堂、南面常委会办公楼，三部分由中央大厅连接。外立面的方案，仍沿用了前几轮设计中曾获得周恩来首肯的西洋柱廊式结构。

这是设计师们多方反复研究、几经修改，最终拿出的最佳方案。它的优越性还表现在大会堂的内部设计上，而这其中很多环节都浸透着全国各地专家的心血和周恩来的智慧。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当属万人大会堂中的大礼堂部分。

大礼堂的内部设计也是大会堂里最复杂难度最大的部分之一。要容纳一万人开会，所以设计了三层结构，一层池座两层眺台。为了保证两层眺台的斜角合理和眺台上观



周恩来在大礼堂模型中

众的舒适度，大礼堂的净高设置成了33米。

这样的高度气势恢宏，可正是这个高度，给顶棚、灯光、音响等相关的设计环节都增加了很大难度。

为了把万人大礼堂内部设计处理好，施工指挥部以1:10的比例，做了一个大模型，摆放在故宫的午门前。

1959年2月初的一天上午，周恩来在万里、

吴晗和沈勃陪同下，走进这个模型。大礼堂的天花板净高33米，按1:10的比例，模型里面应该是3米3的高度。在这里，周恩来给了设计师们一个非常诗情画意的建议。

沈勃回忆道：“进到模型里头，周总理就问，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我就讲，我说不少的建筑师认为内部太高了，人进去会感觉到自己渺小。”

万人大礼堂，不仅仅是一个建筑，这里将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殿堂，它承载着特殊的政治理念，它要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概念，要使工人、农民一走进大礼堂，不仅感觉到庄严雄伟，同时也感觉到自己是这座建筑的主人。

而现在让人觉得自己渺小的问题，显然不符合大礼堂的设计要求。这个问题也困扰了设计师们很长时间。

周恩来用商量的口气说：“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不觉得很远。”在场的人都静静地听着，思路跟着总理走起来。

接着周恩来继续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